

二十世紀捷克斯洛伐克的 女性學者與漢學研究



左上：Berta Krebsová

右上：Jarmila Kalousková

左下：Dana Heroldová

右下：Vlasta Hilská

(引自：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

Adéla Jůnová Macková 著

捷克科學院馬薩里克研究所暨檔案館 (Masaryk Institute and Archives of the CAS)

湯雅婷 中譯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 第 45 期 2025.12

一、緒論

二十世紀的中歐地區，不論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層面都經歷了許多變革。1918 年哈布斯堡王朝垮臺後，新興的獨立繼承國相繼成立，其中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獨立建國後，捷克與斯洛伐克的教育與科研機構迅速發展，這一變化反映在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學文學院的研究領域與科研專班的成長上。1882 年，布拉格大學被分為捷克語與德語兩個系統，兩校均參與東方研究的發展，直到 1938 年捷克語大學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被迫關閉；而 1945 年戰爭結束後，布拉格的德語大學也隨之退場。^❶ 語言學層面的東方研究亦可見於神學院，他們教授希伯來文與亞述文。這些領域的研究與人員進用都由男性主導，儘管捷克斯洛伐克於 1918 年成立時即頒布性別平等法，但捷克地區女性的社會地位要到二十世紀上半葉才逐漸提升。轉捩點發生在 1945 年之後，此時女性開始進入各科學領域任職，擔任管理職的情況也日益普遍。

第一所女子文法學校 Minerva 於 1890 年在 Eliška Krásnohorská 的籌劃下於布拉格開辦，該校畢業生成為捷克地區首批就讀大學的女性。1900 年，有 8 名女性自查理大學文學院畢業，並獲得教授物理、數學、歷史與地理的資格。1901 年，Zdenka Baborová 成為首位於查理大學獲得生物學博士學位的女性；1925 年，Milada Paulová 成為該校文學院第一位女性副教授，並於 1935 年晉升為該院首位歷史學特任教授（譯按：extraordinary professor，較副教授地位高，但尚未獲得國家任命為正教授者）。

對於男性而言，通往大學教職的職涯雖然較為順暢，但過程同樣漫長。獲得博士學位或副教授職銜通常需要二十年，且只有特任教授和正教授的職稱才是有給職。科學與理工科系雖然提供給薪的研究助理職位，但由於缺乏後續的升遷管道，即使從經濟層面來看，也意味這是一份艱難的工作。依據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建國十周年的統計數值，全國共有 1,200 名教授與副教授，當中女性僅有 6 位副教授，無人任教授職。情況在後十年稍有改善，1937 年的統計顯示有 1,500 名教授與副教授，其中女性有 3 名特任教授（醫師 Božena Štúrová-Kuklová、藥理學家 Hedwig Langeckerová，以

* 本篇文章承蒙捷克科學院馬薩里克研究所暨檔案館「Project Strategy AV21: Anatomy of European Society」之專案資助。

❶ 本文探討的是捷克的東方學研究。關於捷克東方學的概況，可參見以下捷英雙語章節：Adéla JÚNOVÁ MACKOVÁ, "Orientalistika na Filozofické fakultě Univerzity Karlovy v Praze / Oriental Studies at the Faculty of Arts of 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 in *Československo v Orientu: Orient v Československu / Czechoslovakia in the Orient. The Orient in Czechoslovakia*, ed. Adéla JÚNOVÁ MACKOVÁ and Libor JŮN (Praha: MÚA AV ČR, 2022), pp. 46-61. 關於布拉格德語大學的德語東方學研究，可參見：Jana RATAJOVÁ, "Orientalistika na Filozofické fakultě Německé univerzity v Praze / Oriental Studies at the Faculty of Arts of the German University in Prague," in JÚNOVÁ MACKOVÁ and JŮN, *Československo v Orientu: Orient v Československu / Czechoslovakia in the Orient. The Orient in Czechoslovakia*, pp. 22-45.

及歷史學家 Milada Paulová) 及 10 名副教授，翌年則增為 11 名。1920 與 30 年代分別記錄有約 1,500 名助理與 1,655 名講師。^② 我們雖然沒有確切的統計數據，然而根據現存資料顯示，大學內的女性多任職於圖書館基層職位，或擔任行政人員與助理。部分講師亦由女性擔任，主要集中於文學院的語言課程。和亞非研究所有淵源的 Madeleine Vokounová-Davidová 正是一名英文講師；印度學學者 Vincenc Lesný 的妻子 Milada Krausová-Lesná 則在捷克科技大學教授丹麥語與挪威語。查理大學的研討班與大學圖書館也同樣聘雇女性在圖書館工作，第一位女性特任教授 Milada Paulová 便是從大學圖書館展開其學術生涯。

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女性科學家的就業非常困難，她們多數擔任高中教師，並同時在其研究領域內發表學術文章。同時，女性在科學研究上擔任助理與男性、丈夫和父親共事的情形逐漸增加。在人文學科領域，我們僅能在少數案例見到夫婦皆有職涯的婚姻，例如前述的 Milada Krausová-Lesná 與印度學者兼翻譯家的丈夫 Vincenc Lesný。同樣值得一提的是父女合作的模式，例如人類學 Jindřich Matiegka 教授與其女兒 Ludmila Matiegková，或是埃及學的 František Lexa 教授和其女 Irena Lexová。

若我們比較女性參與政府部會設立的科學學會與學術研究機構的機會，便可觀察到類似的情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創立於 1791 年的皇家波西米亞學會 (Royal Bohemian Learned Society)，以及 1890 年成立的捷克科學與藝術學院 (Czech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rts)，兩者於 1952 年被併入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在皇家波西米亞學會整個存續期間，僅有 3 名女性成為學會會員，首位女性是 1929 年入選的 Milada Paulová，她同時也是捷克科學與藝術學院科學界僅有的兩名女性之一，但直到 1946 年才獲得任命。1918 年之後，各部會仍持續成立許多國家級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當中包含亞非研究所。女性在研究所內僅能被選為特別會員 (extraordinary member)，第一位女性會員是 1930 年獲選的 Ludmila Matiegková，她是一名高中教師，同時也是著名人類學家 Jindřich Matiegka 的女兒，對埃及學懷有興趣並曾於人類學領域發表學術文章。醫師 Vlasta Kálalová Di-Lotti 於 1925 至 1932 年擔任巴格達捷克醫院的院長，她在伊拉克經營醫院的同時也參與熱帶疾病的研究，並在伊拉克期間獲選為會員。另外還有關注埃及藝術的 Pavla Fořtová-Šámalová，做為共和國總統辦公室主任 Přemysl Šámal 的妻子，她的入選絕非偶然；以及 Madeleine Vokounová-Davidová，她在布拉格的捷

② 請參見：Soňa ŠTRBÁŇOVÁ, “The Institutional Position of Czech Women in Bohemia 1860-1938,” in *Women Scholars and Institutions*, ed. Soňa ŠTRBÁŇOVÁ, Ida H. STAMHUIS, Kateřina MOJSEJOVÁ, *Práce z dějin vědy*, vol. 13A (Praha: Výzkumné centrum pro dějiny vědy – Ústav pro soudobé dějiny AV ČR, 2004), pp. 69-97; Hana BARVÍKOVÁ and Martin MARTINOVSKÝ, “Memberships of Women in the Leading Learned Institutions in the 20th Century,” in Štrbáňová, Stamhuis, Mojsejová, *Women Scholars and Institutions*, pp. 189-220; Petr Svobodný, “Women Docents and Professors at Medical Faculties in Czechoslovakia 1918-1939,” in Štrbáňová, Stamhuis, Mojsejová, *Women Scholars and Institutions*, pp. 375-390. 有關捷克科學界的女性之最新研究著作，可參見：Marie BAHENSKÁ, Libuše HECZKOVÁ, Dana MUSILOVÁ, „Ženám žádný obor vědecký od přírody není uzavřen.“ *Spletné cesty žen k vědecké kariéře v první polovině 20. století* (Praha: MÚA-Academia, 2023).

克語大學文學院教法語，並替亞非研究所出版的重要學術期刊《東方檔案》(Archiv Orientální) 翻譯東方學家的學術文章。我們之後會再回來討論亞非研究所，此處須注意的是，雖然成為研究所會員不代表獲得給薪的研究職位，但此身份讓成員能夠參與大學與學院外的東方學術研究與討論平臺。^③

這種情況清楚顯示出，女性在東方學研究領域上確實有施展才華的機會。然而，女性很少專門研究埃及學或印度學，通常是作為自身專業的延伸補充，例如前述的 Pavla Fořtová-Šámalová 是以畫家身分研究埃及裝飾藝術；Irena Lexová 則是以舞蹈藝術家的背景研究古埃及舞蹈。女性通常在文學院就讀，學習可應用於中學教育的學科，例如語言、歷史或精密科學（後者在 1920 年成立獨立的理學院後，便從文學院中被劃分出來）。那些已經在 1920 或 30 年代學習過東方學的女性學者則選擇諸如哲學、歷史和語言等科目，她們隨後藉由教育與國家啓蒙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National Enlightenment）的獎學金，繼續在國外從事東方語言的研究。其中部分人於戰後再次進入文學院深造，因當時出現嶄新的學術契機，特別是遠東的歷史與文化研究，包括日本學與漢學。

二、1938 年以前大學東方研究的發展——漢學？

東方研究作為一門大學學科是漸進式建立起來的。自十九世紀以來，東方研究即持續在捷克地區的大學中發展，在布拉格查理大學分為捷克語與德語兩校後，主要的學科亦持續在捷克語大學內教授，並由領銜的東方學家 Rudolf Dvořák^④ 與 Josef Zubatý^⑤ 開課講學。這兩位教授的研究領域非常廣泛，涵蓋比較語言學、印度語、漢語、阿拉伯語、波斯語和土耳其語，這也預示了他們學生研究方向的多元性，並促成文學院與神學院逐漸設立其它以捷克語授課的東方學科。在 1920 年代相繼成立了許多研討專班，包含比較語言學、埃及學、印度學、西臺學、東方輔助科學、波斯語、土耳其語，以及閃米語；在神學院中也開設希伯來文及亞述文課程。不過，在 Rudolf Dvořák 教授於 1920 年過世之後，建立遠東文化與語言研討專班的推力也隨之完全消失了。

③ Vincenc LESNÝ and Zdeněk FAFL, eds., *Věstník Orientálního ústavu v Praze za desetiletí 1928-1938* (Praha: Orientální ústav, 1938).

④ Rudolf Dvořák (1860-1920) 為一名捷克東方學家，同時也是查理大學文學院的東方語言學教授。他於 1903 年與 Josef Zubatý 一起成立了「東方語言學手冊圖書館」(Handbook Library of Oriental Philology)，後來發展為「東方學研究室」(Orientalist Seminary)。參見：Olga Lomová et al., *Ex Oriente lux. Rudolf Dvořák (1860-1920)* (Praha: FF UK, 2020).

⑤ Josef Zubatý (1855-1931) 是捷克印度學者與詞源學家，專精比較語言學和印度學，於 1906 年獲聘為印度語言學與比較語言學的專任教授。1919 至 1920 年間曾任查理大學校長，1923 至 1931 年則擔任捷克科學與藝術學院的院長。

然而，在教育與國家啓蒙部最初的規劃中，是設想至少將漢學納入大學文學院的一個學科領域。東方學家 Alois Musil 是一名聖經學與阿拉伯語學者，他從 1920 年起即在布拉格查理大學擔任專任教授。^⑥他過去在維也納大學任職期間，曾參與商務博物館（Handelsmuseum）與東方學院（Oriental Academy）的工作，該學院旨在培育外交人員。在布拉格時，他試著運用他的經驗，無論是在大學或是成立亞非研究所的提案上，^⑦都試圖連結君主國與埃及王室的經濟與文化關係。Musil 成為替教育部提供諮詢的東方學家之一，以應對捷克斯洛伐克對於東方的新興關注。因此不意外地，當教育部的高級官員 František Drtina 於 1920 年希望讓一名在德國工作的義大利漢學家 Eduard Erkes^⑧進入文學院時，正是向他提議。^⑨Musil 向 Drtina 保證，捷克斯洛伐克國內已有足具潛力的漢學家，他指的大概是 Jindřich Tůma。^⑩他曾於 1920 年向教育部長 Josef Šusta 引薦 Tůma，表示他是一名前途無量的學生，正勤奮學習日文和中文，應該被派遣至北京或東京留學，以增進經驗並提升口說能力。^⑪

幾乎在同一時間，外交部也提出另一項提案，建議在布拉格查理大學文學院建立漢學研究，提案人是新上任的捷克斯洛伐克遠東外交代表 František Chvalkovský，^⑫他分別聯繫了查理大學的校長室，以及擔任教育部長的布拉格大學世界史教授 Josef Šusta。此事起因於 Chvalkovský 曾和中華民國代表韓汝甲會面，韓汝甲在中華民國歐洲考察團的基礎上，表達了他們有意在布拉格成立中國研究所的意願。Chvalkovský 試圖向教育部推薦此想法，並建議將研究所設置於布拉格查理大學體系內。他深知此計畫背後的潛在困難，特別是經費不足的問題。但此問題可望部分由中國政府的提議解套，中方願意為在歐洲設立的此類機構共同出資，並分配總計 5,000 英鎊的經費。為了討論此案，Alois Musil 以東方研究專家的身分，受邀出席一場教育部召開的專案

⑥ 參見 Sarah LEMMEN, “Unsere Aufgaben in der Orientalistik und im Orient – Die Gründung und die erste Dekade des Prager Orientalischen Instituts in der Zwischenkriegszeit,” in *Orientalismen in Ostmitteleuropa. Diskurse, Akteure und Disziplinen vom 19. Jahrhundert bis zum Zweiten Weltkrieg*, ed. Robert Born and Sarah Lemmen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14), pp. 119-143; Pavel ŽĎÁRSKÝ, “Alois Musil jako zakladatel československé orientalistiky – ve službách republiky,” *Nový Orient* 69.1 (2014): 54-60; Adéla JÚNOVÁ MACKOVÁ, Pavel ŽĎÁRSKÝ, Tomáš GECKO, *Korespondence aloise Musila I. Alois Musil a počátky Orientálního ústavu v korespondenci „otců zakladatelů“* (Praha: MÚA, 2019).

⑦ Alois MUSIL, “Naše úkoly v orientalistice a v Orientě,” *Naše doba* 27.3-4 (1920): 1-20.

⑧ Eduard Erkes (1891-1958)，義大利人，本名 Agostino Edoardo Erkes，是一名在德國工作的漢學家兼民族學者。他最終於 1921 年獲任萊比錫的民族學博物館亞洲部門主任，1947 年起則在萊比錫大學東亞語言學系擔任教授。

⑨ Literární archiv Památníku národního písemnictví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Literature, hereafter: LA PNP), fond Alois Musil, box no. 24, inv. no. 1160. Fr. Drtina 致 A. Musil 信函，1921 年 4 月 20 日，布拉格。

⑩ Jindřich Tůma (1888-1968) 於 1920 年自查理大學文學院畢業，他的博士論文是關於漢字與其在日本的應用，並由 Alois Musil 與 Bedřich Hrozný 負責審查。他曾在文法學校擔任語言教師，並於 1949 年被判入獄勞改七年。

⑪ Národní archiv (National archives, hereafter: NA), fond Josef Šusta, box no. 7. Letter of A. Musil to J. Šusta, 11 January 1920, Prague.

⑫ NA, fond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National Enlightenment – presidium, box no. 343. Folder Chinese Institute in Prague. Letter of Fr. Chvalkovský to J. Šusta, 9 June 1921.

會議。隨後，他被要求提供一份書面意見，其內容後來成為教育部長的「中國文化研究講座或研究所設立報告書」的一部分，報告書內亦納入 Chvalkovský 的提案與大學界的相關意見。¹³

教育部最終給出了贊同的意見，但整件計畫因為客觀原因而被擱置：

本部考量此提案的重要性，並在諮詢 Alois Musil 博士的專家意見後，冒昧地對此案採取以下立場。原則上，本部樂見基於文化與學術理由於查理大學設立中國文化講座或研究所。

查理大學一直致力於確保呈現人類知識的各個領域，它們於戰前即十分重視東方文化，當然也包含中國文化，這點可從該校近期過世的東方語言學教授 Rudolf Dvořák 博士偶爾開設中文課程得到證明。

在 Dvořák 教授離世後，若有來者能將中國文化的成就與願景引介給我們的聽眾，是最為理想的。教育與國家啓蒙部已同意設立中國文化講座，現僅待由專業學者們推薦一名年輕專家予以委任。這名專家必須具備相當之教育背景且受過妥善之學術訓練。然而，一項不可或缺的條件是，中國政府應允許、或至少當協助促成該學者赴中國進行為期兩年的進修研究。Musil 教授建議 Chvalkovský 博士應該向中國政府說明此前提條件。然而，此講座的正式設立可能尚須約 5 至 6 年，以完成其所需的大學專業教育與科研訓練。¹⁴

Musil 的報告同時也強調，在布拉格設立中國研究所的好處之一，是可以教育中國高中生，最好能與法國院所合作，以替這些學子前往歐洲就讀大學鋪路。最終，中國研究所或是漢學研究班的計畫主要因為經濟因素而僅止於紙上談兵。捷克斯洛伐克向中東或遠東出口的宏大計畫於 1920 年代逐漸荒廢，一切進展都被再三延後。借重科研人才發展出口的龐大計畫遂因此被放棄，而查理大學的研討班則縮限為近東與中東課程，每班僅由一名教授與一至二名副教授組成，且他們的工作並未給酬。前述的 Jindřich Tůma 如同其他人一樣，最後選擇了中等學校的教職工作。捷克漢學一直要到 1947 年才在布拉格大學正式建立，當時在院長 Jaroslav Průšek 的帶領之下成立了遠東語言學系。

¹³ NA, fond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National Enlightenment – presidium, box no. 343. Folder Chinese Institute in Prague. 2 October 1921, Prague.

¹⁴ LA PNP, fond Alois Musil, box no. 24, inv. no. 1160. 教育部致外交部的一封信函影本，該信發給 Musil 徵詢意見，1921 年 10 月 26 日，布拉格。

三、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亞非研究所與漢學

雖然我們不能說查理大學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已經設立漢學研討專班，但布拉格亞非研究所確實開始教授漢語。亞非研究所是教育與國家啓蒙部補助成立的國家機構，其主要任務是爲了培養與東方的文化與經貿關係。研究所的經濟部門致力於媒合捷克斯洛伐克出口商與近東和遠東地區之間的貿易，並試圖建立一個網絡，由各國具經濟專業的官員組成。文化部門出版了學術專書與重要期刊《東方檔案》（*Archiv Orientální*），並舉辦有關東方主題與語言學習的學術與通俗演講。¹⁵此類活動也在查理大學文學院與商業大學（University of Commerce）展開，東方研究的教授們紛紛開設實務的語言課程。在1930年代，亞非研究所開始教授那些因爲種種原因而未在大學開課的語言。我們沒有這些課程的教學時數與出席人數的精確統計數值，但依據現存年度報告內的參考資料，可以推知當時授課的語言種類與教學密度。

在捷克斯洛伐克，日文與中文的教學相對匱乏。後因贊助者實業家三井高陽對文化部門的經濟資助，促使日語教學得以實現；而中文教學最終則由經濟部門落實，因爲出口商與相關企業有學習中文的巨大需求。最初的中文課規模甚小，資料記載最早的課程是1929年秋季由Droam Wang所開授。從現存的資料中，我們無法確定這門課是否在1930年持續，但一年之後，課程教學的問題借助科技之力得到解套。

由於缺乏中文講師，加上對中國和其語言的興趣與日俱增，我們購置了一套留聲機播放的中文會話課程，並開放給有興趣的人們使用。¹⁶

中文語言課程於1934至1937年持續開設，儘管大部分是針對初級者且僅限一學期。相關檔案內並未記載授課教師的姓名，因此推測這些課程可能僅是使用上述留聲機錄音檔進行的。

於1934年，中華民國駐布拉格大使館成立，捷克斯洛伐克與中國之間的文化關係開始活躍起來。1936年亞非研究所成立了中國協會（Chinese Association），並與裝飾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Decorative Arts）合辦了兩場中國藝術的展覽。亞非研究所同時於1931年獲得韓汝甲的捐款，¹⁷這筆經費被存入所謂的中國基金（Chinese Fund）內，旨在用於建設布拉格的中國學院，以及充實亞非研究所圖書館的中文專

¹⁵ Adéla JÚNOVÁ MACKOVÁ, "The Oriental Institute in Prague: Cultural Department and the Orient," in *Visualizing the Orient. Central Europe and the Near Eas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Egypt and Austria Proceedings*, ed. A. Jůnová Macková, L. Storchová, L. Jůn (Prague: AMU – FAMU, 2016), pp. 129-144.

¹⁶ Masarykův ústav a Archiv Akademie věd ČR (Masaryk Institute and Archives of the Czech Academy of Sciences, hereafter: MÚA, A AV ČR), fond Oriental Institute, box no. 11, inv. no. 34. 亞非研究所1931年的年度報告。

¹⁷ MÚA, A AV ČR, fond Oriental Institute, box no. 11, inv. no. 34. 亞非研究所文化部門委員會報告，1931年5月4日。捐款金額爲11,425捷克克朗，並作爲「布拉格中國研究所成立基金」存入Zemská銀行。

區。之後，其經費用途擴展到獎學金上。亞非研究所唯一研讀中日文的獎學金獲獎者是 Jaroslav Průšek，他在布拉格大學念完古代史與拜占庭歷史後，前往歐洲大學攻讀日語和漢學。他赴遠東進一步深造時，正值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濟受到經濟大恐慌衝擊之際，亦使各部會與國家機構的資金捉襟見肘。¹⁸ 這些語言受到經濟部門支持，因此 Jaroslav Průšek 不只接受文化部門的補助，同時也再三受惠於經濟部門，而得以在海外長時間停留。Průšek 先後在北京大學與上海學習，加上隨後赴日本的經歷，奠定了他二戰之後的學術生涯基礎。他於 1937 年自東京返國後，亞非研究所聘用他在語言課程教日文與中文。1936 年，在亞非研究所內設立的中國協會接手教學事務，由 Průšek 擔任協會的執行主管，並於 1938 年 R. Kalina 辭職後接任協會會長。1938 至 39 年間，亞非研究所開設了初級與進階兩階的中文課程，而在茲林（Zlín）的世界聞名製鞋公司 Bat'a 內也舉辦中文與日文課，Jaroslav Průšek 便為這些課程編製了一本中文教材。¹⁹ 一年之後，他與在日本居住期間結為夫妻的妻子 Vlasta Novotná-Průšková²⁰ 一起出版了日語課程的教科書。²¹ 為了支援受經濟大恐慌衝擊的捷克斯洛伐克出口業，於 1935 年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出口研究所（The Czechoslovak Export Institute）也同時體悟到日文與中文能力的重要性，任用 Jaroslav Průšek 於該機構開課。除了在圖書館分類編目日文與中文書的工作之外，語言教學也成為讓 Průšek 繼續鑽研專業領域的好機會；儘管大學教授與亞非研究所多次催請，東方語言領域仍然未獲布拉格大學的正式支持（尤其是在經濟層面上）。

自 1939 年以來，大學的東方研究經歷了重大變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 1939 年 9 月捷克境內大學的關閉，使大學教學陷入中斷。捷克的大學被關閉後，一年內教師們紛紛被安排轉換至所謂的有薪假（leave with pay），只領取基本工資。亞非研究所成為當時的重要機構，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東方研究上扮演著重要角色。儘管研究所自成立以來未設置給薪的研究職位，但直到 1944 年，該所仍持續出版學術專書，並在期刊《東方檔案》上發表法文及德文的學術論文。同樣地，在經歷了捷克—德國共治、以及之後德國的完全治理之後，東方語言的教學得以保留並持續發展。與戰時的情形相比，近東與遠東語言的教學當時是以更大的規模在進行。

¹⁸ 除了 Průšek 之外，另名學生 Herdan 先生也於 1937 年申請就讀漢學的獎助金，但當時捷克斯洛伐克深受 1932 年經濟大蕭條的衝擊，因此無法再資助另一名學生。參見：MÚA, A AV ČR, fond Oriental Institute, box no. 11, inv. no. 34. 亞非研究所文化部門委員會報告，1937 年 1 月 29 日。

¹⁹ Jaroslav PRŮŠEK, *Učebnice mluvené čínštiny* (Zlín: Vyšší lidová škola T. Bati ve Zlíně, 1938).

²⁰ Vlasta Průšková（原姓 Novotná，婚後先隨夫姓為 Průšková，後再婚改姓 Hilská）是一名捷克日本學家（1909-1968）。她在 1928 至 1934 年間於查理大學文學院學習英文與比較語言學，在布拉格完成學業後，她前往英國攻讀日文，並於 1936 年赴日本留學一年。戰後，她曾在新聞資訊部工作，並於 1952 年轉調至查理大學文學院，擔任遠東語言學與歷史學系的主任。

²¹ Jaroslav PRŮŠEK and Vlasta PRŮŠKOVÁ, *Učebnice hovorového jazyka japonského* (Praha: Orientální ústav, 1939).

根據統計資料，我們可以追蹤當時課程與學生的數量、教師姓名，甚至有一份清單，內容包含所有學生的姓名、選修的語言課程，以及選擇那門語言的理由。所有的日文與中文課程皆由 Jaroslav Průšek 授課，於 1939 至 45 年間，他幾乎開了 50 堂課，之後當德軍要求開設語言課程時，他也以德語上課。語言教學對於 Průšek 而言，不只代表一份穩定的收入來源，在研究所活動受限的時空背景下，他還能獲得年度獎金，同時也使他免於被徵召至戰時的工廠部門。他也因此能夠在戰爭期間全心全意專注於自己的學術專業，並在戰爭結束後充分運用他的知識。

戰後，語言課程在亞非研究所內以「東方語言學校」名義順利延續。1947 年，東方語言學校被併入愛德華貝奈斯商學院（Edvard Beneš Academy of Commerce），之後於 1951 年轉為國家語言學校的東方學院。這些課程持續被各大學的東方研究學生們做為他們本科領域外的補充知識，課程也包含近東、遠東以及非洲的語言，中文與日文則分為幾個級別固定開課。戰後時期一份載明學習動機的學生名單被保存下來，從中可知，選修中國研究的主要是文學院的學生，他們多以語言學研究為主要動機，並且通常也結合經濟學和政治學的興趣。其他的學習動機包含技術用途、政治宣傳需求以及熱帶醫學。儘管在戰後開放最初幾年內，在 Jaroslav Průšek 的領導下大學內已有女性學習漢學，²² 但這些申請者之中未有任何一名女性。漢學首次作為一門大學學科是在 1946 年歐洛慕奇（Olomouc）的帕拉茨基大學（Palacký University），當時在印度學家 Vincenc Lesný 與 Jaroslav Průšek 的支持之下成立了東方研究。隨後，自 1948 年起，漢學由 Průšek 的傑出學生 Augustin Palát 負責帶領。²³ Průšek 的學術生涯與布拉格密不可分，他不只在查理大學文學院建立了漢學研究，還在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下設立大型的漢學部門。1947 年時，在他的領導下，查理大學設立了遠東語言學系，後隨著 1950 年組織編制的重組，進一步轉型為遠東歷史與語言學系。於 1947/48 學年起，漢學與日本研究領域開放學生選修，開設了中國與日本文學、文本閱讀與分析，以及東亞地區文化史概論等課程，均由 Průšek 主持規劃。現代漢語教學則在亞非研究所贊助之下，與 Augustin Palát 在該所語言學校開設的課程相結合。Průšek 的第一代學生——他的第二任妻子 Berta Krebsová、Daniela Šejnohová（娘家姓 Khestlová）與 Jarmila Kalousková——日後都參與了查理大學文學院的漢學教學，以及亞非研究所的科研計畫。²⁴

²² MÚA, A AV ČR, fond Oriental Institute, box no. 14, inv. no. 43. 1940 與 1950 年代東方語言學校課程的選課名單。

²³ Lada VOKŘÁLOVÁ, “Počátky orientalistických studií na Univerzitě Palackého v letech 1946-1951,” *Dálňý východ* 7.2 (2017): 59-92.

²⁴ Ondřej ŠKRABAL, “The History of teaching Classical and Literary Chinese in Czechia,” in *Teaching Classical Chinese*, ed. Wen LI and Ralph KAUZ (Gossenberg: Ostasienverlag, 2021), pp. 45-53. (full chapter pp. 33-87)

四、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與漢學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亞非研究所逐漸轉型為一所設有給薪研究職位、專門聘用東方研究學者的科研機構，戰爭期間被廢止的經濟部門則未在戰後恢復。到了 1940 年代晚期，研究所首次進用給薪員工，主要負責辦公室營運與行政事務，以及新成立的大眾期刊《新東方》（*New Orient*）的相關工作。直到 1950 年，研究所才正式聘請圖書館與東方語言學校的專業人員。語言學校是由戰前的語言課程轉型而成，後來成為亞非研究所的一部分，之後隸屬於愛德華貝奈斯商學院，最後被整併入國家語言學校，成為東方語言學系。在其教職員名單中，我們發現除了於 1929 年起在研究所任職的會計 Anselma Šotnerová 外，還有另外三名女性，分別是受過法律訓練的 Markéta Eisenkolbová，她負責《新東方》行政業務；管理東方語言學校行政的 Bedřiška Havlíková，從 1951 年起她同時也擔任韓文教師，並於 1952 年隸屬研究員；以及 Zdenka Jaworská，她當時已經退休，並從國家圖書館轉調至亞非研究所圖書館。隨著捷克斯洛伐克科研機關的全面重組與新型機構——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的創立，亞非研究所獲得了正式編制的科研職位。首六名研究人員的學術領域方向仍延續戰爭期間捷克斯洛伐克的東方研究傳統，包含兩名西臺學家（Václav Čihař, Josef Klíma）、兩名印度學家（Adolf Janáček, Pavel Poucha）、一名朝鮮學家（Alois Pultr）以及一名漢學家（Josef Bartůšek）。全部 15 名員工中女性占三分之一，但她們主要被分配於期刊編輯、圖書館與東方語言學校等行政職位。

於 1952 年，查理大學文學院的漢學家 Jaroslav Průšek 教授被任命為亞非研究所的所長。在他積極努力的推動下，該所成為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於 1953 年新成立時的創始機構之一。科學院依照學科領域分為八大類，亞非研究所隸屬於第八類的語言學。在 1952 年，只有男性研究員才能成為科學院的正式成員——院士（academician），女性要到 1960 年晚期才開始被納入院士之列或受任重要職位。她們被任命為部門主管，或偶有案例擔任學術機構的所長。若我們查看科學院成員的統計數據，可以根據人數與其所屬的學科領域來分析 1950 至 60 年代的學者，但無法從性別著手。女性學者因此仍隱沒在整體數字之中（參照表一）。雖然當時沒有科學院的女性成員名冊，但若更仔細地檢視檔案文獻中有關各部門和研究所的資料，我們仍可勾勒出統計數值的概況。在科技、自然與社會科學領域中，科技和自然科學有較多女性職員，但她們多從事次要的助理或實驗室人員職位；而社會科學領域整體女性人數較少，但她們多擔任機構內的研究職或部門主管職務。

表一：1953 至 1971 年亞非研究所人員清單

（譯按：0.5 表示以圖書館員等非研究人員之職稱進行研究工作者）

年分	1953	1958	1963	1968	1971
經費預算 Budget	150 萬 捷克克朗	250 萬 捷克克朗	270 萬 捷克克朗	350 萬 捷克克朗	370 萬 捷克克朗
職員 Staff	39	62	79	90	93
學者 Scholars	18.5	19.5	29	46	38
技術員 Specialists	10.5	32	38	32	45
漢學家 Sinologists	5	13	15	17	20
行政人員 Administrative	5	5	5	6	4
其他 Others	5	5.5	7	6	6

來源：MÚA, A AV ČR, fond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Czecho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box 7, inv. no 22.

亞非研究所成為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內一所極具特殊性的機構。其研究領域、部門架構與人員組成，反映出蘇聯與捷克斯洛伐克在所謂「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國家的經濟與政治利益。國家計畫所規定的任務構成研究所科研工作的基礎，並與其設立宗旨緊密相扣。對這些國家當代政治與經濟成就的研究，以及文化連結的建立日益受到重視，這也反映在亞非研究所日漸重要的地位上。於 1953 至 1968 年間，該所無論在科研或專業人員的經費預算與員額上均成長逾倍。至 1971 年止，漢學研究人員增加四倍，反映出捷克斯洛伐克與中國的關係日益密切。1958 至 1968 年間研究人員的顯著成長，顯示出 1960 年代政治氛圍的相對緩和，甚至部分 1950 年代未能進入學界的學者們，亦得以在研究所內獲得職位。1953 至 1968 年間漢學人力大幅擴充，正與漢學地位的崛起密切相關。即便在 1970 年代初期，當第一代與第二代漢學家多數因政治因素而不得不離開研究所時，漢學研究的編制仍然得以維持甚至增加。這一情況亦可從一份清單上看出，該名單記錄了當時因遭解聘或移民海外而離職的科研人員，呈現出當時整體人事結構的縮減。²⁵

五、第一代學者²⁶

²⁵ Adéla JÚNOVÁ MACKOVÁ, “Orientální ústav ČSAV v turbulencích šedesátých let,” in *Dějiny Československé akademie věd II*, ed. Martin FRANČ and Věra DVOŘÁČKOVÁ (Praha: MÚA AV ČR, 2024).

²⁶ 有關東方學家的簡要傳記，請見：*Kdo byl kdo. Čeští a slovenští orientalisté, afrikanisté a iberoamerikanisté* (Praha: Libri, 1999). 漢學家的簡要生平，參見：Marián GÁLIK, “Preliminary remarks on the Prague school of Sinology II,”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20.1 (2011): 95-113.

亞非研究所在人員編制與研究重點上的轉變，明顯與其納入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體系、Jaroslav Průšek 出任院長後，在國家與體制性規劃框架下賦予研究所的科研任務密切相關。根據一份推測大約在 1952 年初記錄的員工名單，當時印度學家 Vincenc Lesný 仍任所長（但研究所的行政管理係由一個龐大的行政委員會負責，組成成員包含研究所的東方學家與查理大學文學院的教員）。該份名單有趣之處，在於將成員分為科研人員（scientific staff）、科研助理人員（auxiliary scientific），以及圖書館職員三類。科研人員中，有幾位特定領域的優秀人才補強了研究所的實力，包含兩名專攻閩族學與非洲研究的學者 Karel Růžička 與 Stanislav Segert，以及一名印尼專家 Miroslav Opl; 另一方面，朝鮮學家 Alois Pultr 則轉調至布拉格查理大學。在 9 名科研人員中沒有任何女性，她們全都被歸在科研助理人員之列。**Markéta Eisenkolbová** 負責期刊《新東方》，**Bedřiška Havlíková** 則主管東方語言學校業務與韓語教學。大部分女性都在圖書館部門工作，**Eliška Merhautová** 與 **Zdenka Javorská** 為專業圖書館員，另外三名女性漢學家 **Ema Bayerlová**、**Berta Krebsová** 與 **Dana Kalvodová** 後來也加入新成立的魯迅圖書館（Lu Sün Library）。總計全部 28 名職員中，共有 11 名女性，當中只有 4 人是行政人員或是清潔員。²⁷

1952 年 3 月至 9 月間，研究所職員數增加了 16 人，總數達到 34 人。本次擴編主要來自於新聘的科研人員與圖書館員。整體而言，有 5 名女性升等至總計 18 人的科研人員職位，分別是 2 名檔案人員（**Markéta Eisenkolbová**、**Bedřiška Havlíková**）、2 名漢學家（**Berta Krebsová**、**Daniela Šejnohová-Khestlová**），以及伊朗研究者 **Věra Kubičková**。與此同時，也有相當數量的男性科研人員加入，包含 2 名檔案人員（**Vilém Gampert**、**Cyrill Horáček**）、1 名漢學家（**Oldřich Švarný**），以及 2 名印度學家（**Ladislav Zgusta**、**Kamil Zvelebil**）。舊職員的動態中，**Zdenka Jaworská** 成為圖書館主任，**Ema Bayerlová** 負責中文圖書館，**Eliška Merhautová** 則繼續擔任專業館員。然而，科研人員與圖書館員之間的調動並非完全準確，年輕的科研人員時常身兼圖書館館務與研究工作，這種模式有助於研究所內不同背景的學者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同時，研究所亦與查理大學文學院密切合作，**Dana Kalvodová** 便是於 1952 年離開研究所圖書館轉至文學院工作。²⁸一年之後，又有 3 名漢學家加入：**Jarmila Kalousková**、²⁹ **Dana Šejnohová-Khestlová** 與 **Jing-yü Rotterová**，接續她們入所的是 **Dana Heroldová-Šťovičková**，但她不久後隨即獲得獎學金而轉赴北京。³⁰

²⁷ MÚA, A AV ČR, fond Oriental Institute, box no. 7, inv. no. 19.

²⁸ MÚA, A AV ČR, fond Oriental Institute, box no. 7, inv. no. 19.

²⁹ Xenie DVORSKÁ, “K sedmdesátinám PhDr. Jarmily Kalouskové, CSc.,” in *Bibliografie, Asie-Afrika*, vol. 9, no. 1-2 (Praha: Orientální ústav AV ČR, 1995), pp. 17-19.

³⁰ MÚA, A AV ČR, fond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Czecho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box no. 20, inv. no. 116. 1953 年員工人數與人事動態月統計。

於 1955 年，亞非研究所擁有 51 名職員，當中 19 名為女性，意即佔約百分之四十。但若檢視科研和專業人員中女性員工的比例，情況已不再樂觀。總計 22 名科研人員中僅有 3 名女性（Jarmila Kalousková、Berta Krebsová 與 Věra Kubičková），而在 14 位專業人員中，若包含學術圖書館員工，計有 9 名女性：前述的 Ema Bayerlová、Bedřiška Havlíková、Markéta Eisenkolbová、Zdenka Jaworská、Eliška Merhautová 與 Jing-yü Rotterová，以及新擴編的突厥學家 Zdenka Veselá-Přenosilová 和 2 名漢學家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③①} 與 Eva Rychterová-Kreisová^{③②}。到 1959 年亞非研究所已有 63 名職員，其中 19 名為科研人員。^{③③} 2 位漢學家 Dana Heroldová-Šťovíčková 和 Zdenka Heřmanová-Novotná 於 1958 年自中國留學歸國，並重新加入研究所。

1. 1952-1953 年間的女性學者

在 1952 和 1953 年間，畢業於兩次大戰期間的第一代女性學者以科研人員身分加入亞非研究所。在這 8 名女性研究員當中，有 6 名是漢學家，她們在布拉格查理大學文學院接受的教育主要以語言學和歷史學為導向。1940 年代由亞非研究所 Jaroslav Průšek 籌辦的東方語言課程，在她們日後的漢學研究生涯上扮演關鍵角色。Berta Krebsová 原是一名高中教師，她於戰爭期間參加了這些語言課程，並於戰後前往巴黎研讀漢學一年，隨後進入文學院修習漢學與遠東歷史，之後成為 Jaroslav Průšek 的第二任妻子。她於 1952 年進入亞非研究所，並在一年之後成為漢學部門的主任。Ema Bayerlová 和 Dana Kalvodová 主要在研究所的中文圖書館工作，然而，在加入研究所後不久，Kalvodová 便於 1952 年轉調至查理大學文學院，專注研究中國戲曲。1953 年起，來自中國天津的 Jing-yü Rotterová^{③④} 也進入亞非研究所，並任職於圖書館的中文部門。高中教師 Jarmila Kalousková 參加了東方語言學校的中文課程，戰後也曾於查理大學文學院旁聽學習中文。她於 1953 年被亞非研究所聘為研究員，並透過內部學術交流，於 1956 至 57 年赴北京中國科學院的語言研究所交換。同年，Jaroslav Průšek 第一批學生之一的 Dana Šejnohová-Khestlová 同樣獲得去北京大學留學的機會。漢學部在亞非研究所中相對重要的影響力，來自於國家計畫下編製《捷克漢文字典》的任務。該編輯委員會包含 Jarmila Kalousková 與 Dana Šejnohová-Khestlová，字典的編纂工作幾乎完全由女性科研人員主導。

^{③①} Vladimír LIŠČÁK and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Z minula i z budoucna,” in *Bibliografie, Asie-Afrika*, vol. 10 (Praha: Orientální ústav AV ČR, 1997).

^{③②} MÚA, A AV ČR, fond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Czecho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fond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Czecho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box no. 20, inv. no. 116.

^{③③} MÚA, A AV ČR, fond of the VIIIth Section of the Czecho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box no. 10, inv. no. 20. 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第 8 分院各研究機構員工統計總表。

^{③④} Jing-yü Rotterová 於 1923 年生於中國天津，她自 1953 年起即在亞非研究所工作。

2. 1955 和 1958 年的女性學者

亞非研究所與漢學部在 1955 年和 1958 年的規模擴大，與圖書館遠東部門的擴增及《捷漢字典》的編纂工作密切相關。圖書館主要聘用女性學者，她們同時兼任研究和圖書管理的雙重職責。在新聘用的 8 名女性學者之中，有 7 人研究遠東語言和歷史，其中 4 人專攻漢學。她們全數於戰後在查理大學文學院接受 Jaroslav Průšek 的指導學習漢學。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正是因閱讀 Jaroslav Průšek 的專書 *Sister My China*³⁵ 後大受啟發，遂決定攻讀漢學。儘管她因為出身階級背景的關係，未獲推薦進入大學，但漢學是當時的政策需求學科，而這位對於現代中國懷抱熱忱的學生最終獲准入學。在她的簡要回憶錄中，她描述了 1950 年漢學部的情況，當時教學仍處於草創初期，師資有限，部分學生甚至很快便被派至中國教語言。Jaroslav Průšek 同時身兼亞非研究所所長與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的管理要職，無暇專注在教學上，因此他用三小時的考試來取代各種研討專班。這類考試令人畏懼，但是其涵蓋語言、文化與跨世紀政治的問題，卻也鼓勵學生涉獵從中國神話、現代小說到當代歷史等廣泛主題。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於 1955 年畢業後，與三名同學被選派籌備亞非研究所的魯迅圖書館。儘管她原先計畫從事外交或出口貿易工作，但最終仍選擇在亞非研究所任職。這份工作須兼顧圖書館行政與研究，她和同事在三年內完成 Jaroslav Průšek 於 1949 年自中國帶回的 5 萬冊圖書的編目分類，並得以同時繼續深造她的博士論文。她於 1958 年首次前往中國，在北京的中文研究所從事「諸宮調」敘事文體的研究，此議題之後成為她博士論文的主題。1965 年時她完成博士論文答辯，已是一名孩子的母親，十天之後又產下第二胎。1955 年，Eva Rychterová-Kreisová 也進入了亞非研究所。³⁶ 在入所後她立即在捷克斯洛伐克—中國熱帶科技研究站（Czechoslovak-Chinese Research Station for Tropical Technology）擔任翻譯員 9 個月，履行亞非研究所的另一項任務——除了文化代表團外，陪同政治人物、電影製片人與科學家出訪擔任翻譯。1961 年她調至亞非美博物館（Náprstek Museum），專注於中國現代繪畫研究，並策劃一場中國與越南典藏品的特展，此外亦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不同美術館內籌備多場短期展覽。³⁷

Průšek 另外兩名學生的經歷更引人關注，她們畢業後直接赴中國研讀漢學，並在返國加入亞非研究所後，被指派負責《捷漢字典》的編纂計畫。Dana Heroldová-Šťovíčková 是 Jaroslav Průšek 首批門生之一，她於 1947 年起修習漢學與遠東史，畢

³⁵ Jaroslav PRŮŠEK, *Sestra moje Čína* (Praha: Družstevní práce, 1947).

³⁶ Aleš Chalupa, "Employees of the National Museum in the years 1818-1968,"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Museum* 137-139 (1968-1970): 50-101. National Museum Archives, Main register 3, Personal files of National Museum employees.

³⁷ 她與 Adolf Hoffmeister 以及國家藝廊館長暨漢學家 Lubor Hájek 合作出版了以下專書：Adolf Hoffmeister, Lubor Hájek, Eva Rychterová, *Contemporary Chinese Painting* (Prague: Czechoslovak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59).

業後於 1952 和 53 年在文學院教中文，於 1953 年短暫進入亞非研究所後，便被派任至北京大學成為首位捷克語講師，於 1953 至 1957 年間任教。1958 年她回到亞非研究所，擔任辭典編纂工作小組的負責人，首要任務便是籌備《捷漢字典》的編製。在她於 1976 年不幸過世後，由 Zdenka Heřmanová-Novotná 接手負責辭典編纂工作，並同樣貢獻良多。她於 1950 至 1953 年學習中文與遠東歷史，之後在 1953 至 1958 年間前往北京攻讀中國文學與語言。返回布拉格後她即進入亞非研究所，並服務長達三十年。這兩位女性學者都是布拉格首批畢業的漢學家，她們善加利用前往中國長期留學的機會，並於返國後在亞非研究所發揮所長，Jaroslav Průšek 因此逐漸在研究所內建立一個以他的培育門生為中心的龐大漢學部門。

六、第二代學者

非洲與亞洲的政治局勢、所謂開發中國家的去殖民化進程，以及其與東西方的關係，預示了亞非研究所在 1960 年代扮演的關鍵角色。1962 年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舉行年度評鑑，目的是要檢視獨立研究部門的關注重點與組織結構，其中亞非研究所被評估為一所極為重要的機構，但須從根本上進行轉型。³⁸該年的評鑑報告首要強調研究所的研究方向應聚焦於當代議題，並同時保留古代文化、語言與文字手稿的研究傳統。所長 Jaroslav Průšek 在評鑑會議以及委員會的會談中，主要就職員問題進行爭辯，針對該所欠缺科學院著重的政治史與經濟史專才問題，他回應這方面學者和博士後研究員的缺乏，係歸因於該領域在大學教育量能的不足。1963 年 6 月，科學院評鑑委員會通過決議：亞非研究所將依地理區域進行全新的部門重組，並由新人員組成，以因應該所嶄新的發展方針。³⁹印度與東南亞學院以及遠東學院因而隨之擴編。若我們檢視 1961 年研究所人員的構成，全所共 68 人（包含圖書館、檔案館、技術類與行政職），其中有 24 人為科研人員，26 人為專業人員，當中有 8 名科研人員及 18 名專業人員專注於亞洲社會主義國家議題，另有 15 名科研人員和 7 名專業人員從事非洲與亞洲開發中國家研究（其中有 17 人做開發中國家的當代史）。只有兩個領域員工數量較多，便是漢學（17 人）與印度學（9 人），其他學科則僅有 2 到 3 名成員。⁴⁰這延續了亞非研究所自 20 世紀初以來對東方研究的歷史關注。到 1960 年代，研究所內政策導向的重點學科被進一步加強，從該所 1960 年代初至 1970 年代的員工名冊

³⁸ 參見：MÚA, A AV ČR, fond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Czecho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box 7, inv. no. 21. 該份報告建議研究所應把主要重點放在亞洲與非洲的近代史上，「應當鼓勵此類研究趨勢，且應將亞洲與非洲國家的歷史與經濟研究作為亞非研究所學術研究的基礎」。

³⁹ MÚA, A AV ČR, fond Scientific collegium of History, box 6, inv. no. 131 and 132. 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門的組織結構與研究重點考察報告，1962 與 1963 年。

⁴⁰ MÚA, A AV ČR, fond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of the Czecho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I. series, Oriental Institute 1954-1974. 亞非研究所歷史與活動概況，1961 年 1 月 1 日。

中，得以洞悉女性學者在這些學科重組時的貢獻。由於檔案文獻佚失，使我們無法確定員工入所或離所的具體時間，除非 1968 年蘇聯佔領捷克斯洛伐克時，她們移居海外的紀錄有被保存下來；此外，1972 年研究所重組時的相關文獻內也沒有任何關於她們的資訊，當時亞非研究所的管理階層，包含 Jaroslav Průšek 和半數漢學研究人員在內，都因政治整肅遭到清算。

在整個 1960 年代（最遲至 1972 年）期間，有紀錄顯示亞非研究所新聘了 20 位東方學家。他們皆畢業於 1950 年代末至 1960 年代初。其中三分之一早在 1960 年代上半葉即已在所內任職，部分則於 1968 年加入。漢學的重要性，或說遠東研究在當時的主導地位，可以從新進女性科研人員的研究領域中看出。其中 12 人專攻遠東研究（5 名漢學家、2 名日本學家、1 名越南學家、1 名緬甸學家，以及 3 名印度學家），其餘則關注中東、土耳其、伊朗、庫德語以及上古史。^{④①} 1960 和 61 年間，多數女性在圖書館工作，並擁有約百分之三十的時間從事研究，Jaroslav Průšek 當時就已強調研究所的研究重點應轉移至當代政治與歷史。至遲於 1960 年，研究中國戲曲與音樂的 **Xenie Dvorská**，以及漢學家 Oldřich Kral 的學生和妻子——專攻中國古代文學的 **Marta Ryšavá**，兩人加入了研究所的魯迅圖書館。兩人均於 1950 年代在查理大學文學院學習漢學，Dvorská 後曾赴中國留學，在天津音樂學院研究中國音樂，並於 1959 年轉赴北京。^{④②} 四年之後，也許是受到科學院評鑑結論的影響，**Zlata Černá** 也加入研究所成為研究員。她曾於 1958 年以政治代表團的翻譯員身分前往北京，但因為出身背景的緣故而未獲得在當地就學的獎學金。大學畢業後，她曾教中國學生捷克語，並於 1960 至 64 年在國家藝廊的東方典藏部門工作。隨後她調至亞非研究所，參與一項探討亞洲國家現代文學興起的國家型計畫。紀錄顯示，另有幾位女性學者最晚都已在 1970 年代初期於亞非研究所擔任專業人員，包含 Jaroslav Průšek 1950 年代的學生 **Marcela Stolzová-Boušková**、研究中國文學和文化的 **Maria Tereza Slupska-Lechowska**（漢學家 Zbigniew Slupski 的妻子），以及漢學家 Jan Janouš 的中國籍妻子 **Ming-che Janoušová**。至今為止，多數捷克斯洛伐克漢學家的生平尚未收錄於百科全書內，然而他們的科研成果卻已被納入 Gálik 所編的《漢學家研究調查報告》，即便該報告未提供更深入的傳記資料。^{④③} 1950 年代研究所大部分的新進女性漢學研究者，主要工作多是編纂《捷漢字典》，這項工作在 1960 至 70 年代持續進行；而較晚進入研究所的女性漢學家，則以現代中國文學為主要研究內容，這亦是國家計畫的核心任務之一。兩代女性學者當時都積極參與魯迅圖書館的編目工作。

④① 有關亞非研究所女性職員名單（依員工清冊劃分），請參見：MÚA, A AV ČR, fond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Czecho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box 7, inv. no. 22. 亞非研究所 1971 至 1972 年職員名單，以及 box no. 20, inv. no. 105. 亞非研究所 1960 年職員名單。

④② 有關歐洛慕奇（Olomouc）的漢學起源與 Xenie Dvorská 的簡要生平，可參：Lada VOKŘÁLOVÁ, “Počátky orientalistických studií na Univerzitě Palackého v letech 1946-1951,” p. 84.

④③ 漢學家的簡要傳記請見：Marián GÁLIK, “Preliminary remarks on the Prague school of Sinology II,” pp. 95-113.

七、布拉格的「正常化」與漢學

在 1968 至 1969 年間，亞非研究所及其隸屬於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黨組織表態支持「布拉格之春」以及復興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 Alexander Dubček，並反對蘇聯軍隊駐紮捷克斯洛伐克。1968 年 8 月 23 日，研究所發布一份聲明，表示認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十四次特別代表大會的決議，隨後又致函國民議會，信中措辭與聲明類似，所內共有 44 名職員（約佔全體人數一半）連署表達支持。⁴⁴ 亞非研究所領導階層對於布拉格之春的聲援，是 1970 年代初期該所人事大幅異動的主因之一。時任所長的 Jaroslav Průšek 遭到免職，由 Václav Opluštil 接任，這也導致與 Jaroslav Průšek 關係密切的整個管理階層與多數職員相繼出走，其中多數為漢學家。根據 1970 年代初期保存的名單，以及 1968 年 8 月以後的退休與移民紀錄，我們可以描繪出直到 1972 年以前兩代女性學者的動向，例如 Berta Krebsová 和 Jarmila Kalousková 兩人皆於 1971 年非自願退休。第一代女性學者有 10 位是 1950 年代進入亞非研究所的漢學家，當中 2 人轉至查理大學文學院與亞非博物館任職，2 人移民，其餘則留在研究所工作至 1970 年代。第二代女性學者則是自 1960 年代或 1970 年代初期入所的 6 名漢學家，至 1972 年仍在所內任職，其中有 1 人移民。

「正常化」（Normalization）政策在學院的實施，意味著許多研究機構的研究方向發生轉變，同時也汰換一批所謂的「非適任人員」，這些人無論是政治立場或是學術方向都不再符合學院期待。在這些年間，總計有 10 人選擇移民，或赴海外進修後未再返國。Jing-yü Rotterová 在 1968 年移民；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則於 1968 年和家人移居多倫多，並在當地大學任漢學教職；Ming-che Janoušová 於 1971 年赴法國進修後未再歸國，其丈夫與子女仍留在捷克斯洛伐克。新任領導階層接手之後，Jaroslav Průšek 的長期合作夥伴兼前妻的 Berta Krebsová 被強制退休；亞非研究所內共產黨組織的管理階層亦全數離職，其中 Sonia Černá 的立場甚至被描述為「對現任領導人的積極反抗」。1970 年代初，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對幹部成員展開政治審查，導致被開除共產黨黨籍的全部科研人員與部分專業人員因此離職。⁴⁵ 目前仍無法確知上述女性漢學家的確切離所時間，但大部分都是於 1970 年代離開研究所。

研究所進行科研重組的官方理由，歸因於以往的研究主題過於偏重語言學、文學（例如 Marta Ryšavá 就被新的管理團隊認為不適合從事現代中國文學研究）以及歷史和古代文明等領域。這些主題後來被亞非國家的當代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所取代，

⁴⁴ MÚA, A AV ČR, fond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Czecho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box 8, inv. no. 29. 亞非研究所 1968 年 8 月 23 日的聲明，與 1968 年 8 月 26 日亞非研究所致國民議會的信函。

⁴⁵ MÚA, A AV ČR, fond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Czecho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box 7, inv. no. 22. 有關亞非研究所正常化與重組的相關文件，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委員會與亞非研究所科研人員會談的會議紀錄，1972 年 7 月 31 日。

並尤其著重於中國的發展。⁴⁶ 與 Jaroslav Průšek 同期於 1950 至 60 年代入所的那一代學者，在此波人事肅清中首當其衝，而漢學與印度學領域的人力縮減最為嚴重。伴隨聚焦於現代中國之新研究任務的展開，漢學團隊流失一半以上的人才，對於研究所的衝擊格外顯著。

⁴⁶ MÚA, A AV ČR, fond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Czecho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box 7, inv. no. 22. 有關亞非研究所正常化與重組的相關文件。Václav Opluštil 向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教育與科學部門部長 J. Obzina 的報告，無日期。Josef KOLMAŠ, “Orientální ústav na prahu „abnormalizace“,” in *Věda v Československu v období normalizace (1970-1975)*, ed. Antonín KOSTLÁN and Markéta DEVÁTÁ, *Práce z dějin vědy*, vol. 4 (Praha: Výzkumné centrum pro dějiny vědy, 2002), pp. 187-200.